



## [明清]黄遵宪与日本汉诗

蔡毅

来源: 中日文化交流集刊

投稿人: 董科

发布时间: 2008-7-16

阅读次数: 405

黄遵宪(1848-1905)作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代表作家,向来颇受学界重视。可是,他在清光绪三年、日明治十年(1877)末至清光绪八年、日明治十五年(1882)初任清朝首批驻日使馆参赞的四年多时间内,与日本汉诗发生过的种种关涉,却至今尚未见有全面深入的综合研究[1]。也就是说,黄遵宪阅读过哪些日本汉诗作品,有怎样的认识和评价?他对明治汉诗坛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与此同时,他自己是否也从明治汉诗那里得到过某种启示?凡此种种,均有待进一步求索查证。本文即拟对上述问题,特别是第三点有关“逆向反馈”的问题,分别试作探讨。

黄遵宪身为晚清杰出诗人,第一次跨出国门,就在一海之隔的东瀛异域,发现了与本土同根同源的汉诗奇葩,其兴趣盎然,自不待言。而且,他肩负外交官使命,立志撰写《日本国志》,并同时推出副产品《日本杂事诗》,以填补对日认识的空白,在执笔时为了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日本汉诗也自然会纳入他的视野。因此,黄遵宪使日期间,与日本汉诗多有接触,并做出了他自己的评价。其最集中的表述,为《日本杂事诗》第76、77首及其自注:

观风若采扶桑集,压卷先编侍宴诗。  
读尽凌云兼丽藻,终推帝子独工辞。

自注:诗始于大友皇子《侍宴》诗,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仪。”殊有天地开辟、日月重光气象。总集之编有《扶桑集》、《怀风藻》、《凌云集》、《本朝丽藻》、《经国集》。延喜、天曆之间,称郁郁乎文矣,然未有专集。其后能以诗鸣者,曰新井君美(著有《白石诗稿》)、梁田邦美(字景鸾,号蛻岩,江户人,有《蛻岩文集》)、祇园瑜(字伯玉,号南海,纪伊人,有《南海集》)、秋山仪(字子羽,号玉山,丰后人,有《玉山诗集》、《玉山遗稿》)、菅晋师(字礼卿,号茶山,备后人,有《黄叶夕阳村舍诗稿》)、赖惟柔(字千祺,号杏坪,安艺人)、赖襄、梁孟纬(字公图,号星岩,美浓人,有《星岩集》)、广濑建(字子基,号淡窗,□□人,有《远思楼诗钞》),皆名家也。

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  
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购诗?

自注:诗初学唐人,于明学李、王,于宋学苏、陆,后学晚唐,变为四灵。逮乎我朝,王、袁、赵、张(船山)四家最著名,大抵皆随我风气以转移也。白香山、袁随园尤剧思慕,学之者十八九。(唐时有小野篁慕香山,欲游唐。小说家称人见海上楼阁,道以待白香山来,殆即日本也。)《小仓山房随笔》亦言鸡林贾人争市其稿,盖贩之日本,知不诬耳。七绝最所擅场,近市河子静(号宽斋,上毛人)、大洼天民(号诗佛,□□人,有《诗圣堂集》)、柏木昶(字永日,号如亭,信浓人,有《晚晴堂集》)、菊池五山(字□□,□□人,有《五山堂诗话》),皆称绝句名家。文酒之会,援毫长吟,高唱往往逼唐、宋。近世文人,变而购美人诗稿,译英士文集矣。

上引文字容有个别舛误,此悉依原文。此外,《日本国志·学术志》“为诗词之学者”部分所列举的作者,也与上述自注相重合。这两首诗及自注,如果说前者主要是综述日本汉诗的整体概况,后者则可以说是侧重于揭示日本汉诗的演变发展。问题在于,黄遵宪在这里表述的对日本汉诗的理解,水平到底如何?细而察之,前者仅止于作家作品的罗列,谈不上理论性的概括分析,可以置而不论;后者值得注意的,也只有“诗初学唐人,于明学李、王,于宋学苏、陆,后学晚唐,变为四灵。逮乎我朝,王、袁、赵、张(船山)四家最著名,大抵皆随我风气以转移也”一句。然而,准之日本汉诗的历史,这个概述并不符合其历时性的纵向流变过程,而毋宁说是一种对其诗风变化的平面性的散点素描。特别是其中“变为四灵”一语,尤为费解。“四灵”如果指的是南宋后期与江湖诗派接近的“永嘉四灵”,即出身于浙江永嘉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则日本汉诗史上并没有他们特别受到青睐的相关记录。鉴于自注对江户后期以市河宽斋为盟主的江湖诗社格外眷顾,这里的“四灵”实为南宋江湖诗派的代称,用以专指日本的同名诗社,亦未可知。与此相关联,有论者推测该语或指市河宽斋江湖诗社的四大弟子:大洼诗佛、柏木如亭、菊池五山,以及自注未提及的小岛梅外,其根据是柏木如亭诗中有“四灵复聚旧江湖”一句[2]。但这个日本版的“四灵”只不过是柏木如亭于诗中偶一为之,并未成为文坛通称,黄遵宪是否知晓内情,特指其事,尚有疑问。而文中“皆称绝句名家。文酒之会,援毫长吟,高唱往往逼唐、宋”一句,则或许其来有自。检江户后期出版的《今四家绝句》,收有市河宽斋、柏木如亭、大洼诗佛、菊池五山等四人七言绝句各一百首,卷首因是道人序曾将四人与“竖称之”的唐宋八大家以及“横称之”的南宋诗人四大家范成大、陆游、杨万里、尤袤相比,认为四人与后者颇为相类,并世同时,三次用了“一时唱酬”,并分别用“其名并隆”、“其名并齐”、“其名并高”来做呼应[3]。细品黄遵宪自注,他对这篇序言似乎曾予留意。

然而,如果与大致作于同时期的俞樾《东瀛诗选序》对日本汉诗高屋建瓴、宏观把握的“二变三期说”相比,黄遵宪的认识显然要肤浅、零散得多。回观《日本杂事诗》第69、75首及自注,以及《日本国志·学术志》于道家、古文家著述列举之细,篇幅之长,就不难看出他对日本汉学的基本态度:赏其文而不赏其诗。

其实,上述汉诗人的作品,包括他罗列的其它汉文著作,黄遵宪是否真正通览过,大可怀疑。《日本杂事诗》的写作,曾得到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如黄遵宪光绪五年(1879)三月致宫岛诚一郎函云:

德行自藤惺窝、文章自物徂徕以下诸公,乞条其名字、籍贯、所著之书,一一以告。汉学宋学又当分别,文章则文与诗亦分举

为妙也[4]。

他在和大河内辉声笔谈时，也请他列示“以文章名世者”，并明言：“专集多未见，选本中曾见其六七。[5]”因此，上引《日本杂事诗》的自注，很可能只是照录他人提供的数据，而非自己研读后的判断。纵观黄遵宪对日本汉诗的看法，可以说与其《日本国志》的编纂方针如出一辙，即“厚今薄古”。他认真阅读、积极评价的，几乎都是同时代人的作品，或者是刚刚去世的江户后期作家。上引第76首自注末尾原稿有“至于近世，尤解吟事”一句[6]，虽然多年后定稿时被删去，但是仍可见从中看到黄遵宪当时的认识。他在《明治名家诗选序》中曾分析过就中原因：

自余随使者东来，求其乡先生之诗。卓然成家者，寥落无几辈。而近时作者，乃彬乎质，有其文。余尝求其故，则以德川氏中叶以后，禁网繁密，学士大夫每以文字贾祸，故啜嚅赧赧，几不敢操笔为文。维新以来，文网疏脱，捐弃忌讳，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7]。

当然，江户后期并非如此万马齐喑，前引黄遵宪称赏的以市河子静（宽斋）为代表的江湖诗社，即这一时期的翘楚；下文要谈到的赖山阳，更是卓尔不群的佼佼者。黄遵宪抑彼扬此，其意乃在凸显维新带来的诗坛新气象。他的这种看法，与本文第三章论其与明治“文明开化新诗”的联系，也不无关系。

黄遵宪于日本汉诗，内心持论其实相当苛刻，但对一位前辈和一位同辈，他却不吝褒词，揄扬有加。这就是赖山阳和龟谷省轩。赖山阳（1780-1832），名襄，字子成，号山阳、三十六峰外史，著有《山阳诗钞》、《山阳遗稿》、《日本外史》、《日本政记》等，是江户后期最负盛名的汉学家。尽管他已于黄遵宪来日四十余年前辞世，但因其史论阐扬民族精神，明治时期仍风行于世。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75首“徂徕而外有山阳”，是二百首组诗中唯一标举作家名字的诗句。在其它文章或笔谈中，但凡提到赖山阳，他也总是肃然起敬：“山阳先生器识文章，仆谓日本盖无流匹。[8]”而较之诗，他更赏其文：“诗不如文，然自有一种不可磨灭之精神，未易及也。[9]”可见他最为赏识的，是赖山阳的“器识”、“精神”。他曾说：

若使山阳在今，必当遍历中土及欧米，必能各舍短而择其长。仆为山阳惜者在此。区区诗文，犹未也[10]。

尤为难得的，是黄遵宪还多次以赖山阳为“典故”。其《续怀人诗》第8首“绝胜海风三日夜，拿舟空访沈南苹”，自注“昔画师沈南苹客长崎，赖山阳闻其名走访之，阻风三日夜，及至，而南苹已归，以为平生恨事[11]”，用以反衬他与宫岛诚一郎的时相往来、亲密无间。在为宫岛《养浩堂诗集》所作序中，他再次以赖山阳为喻：

昔江辛夷一客耳，赖子山阳至度越阡陌远往长崎，待之九十日，卒以阻风，船不果至，空结遐想。余才虽不逮古人，而比之古人为幸良多[12]。

这种对日人故事的“用典”，在中日汉诗交流史上颇为罕见，值得特书一笔。

龟谷省轩（1838-1913），名行，字子省，号省轩，著有《省轩文稿》、《省轩诗稿》等，活跃于明治政界，兼精汉学。黄遵宪与龟谷多有交往，并毫不掩饰对他的钦佩：“于诗最爱龟谷省轩[13]”，“仆来此，最钦慕者，龟谷子一人[14]”，还恳请龟谷为其《日本杂事诗》增删并作序[15]。他之所以于龟谷别具只眼，乃缘于看好龟谷诗艺此后的精进：

足下古诗大可成家，数今日之所造诣，既非余子所能及矣[16]。

鉴于后文还要论及的日本汉诗人之拙于古体，黄遵宪对龟谷省轩从心底寄予了厚望。

要之，黄遵宪使日期间，虽然因倾力编撰《日本国志》，而多注重汉文史籍，但诗人天性，仍使他对日本汉诗屡屡眷顾。掇拾散见于其文集的只言词组，我们可以看到他那别有会心的敏锐目光。

## 二

黄遵宪对日本汉诗的亲感，主要来自一种文化的认同。他在游历欧美后致书宫岛诚一郎，慨叹自己虽然见识了这些“表海雄风，泱泱大国”，但终感隔膜，难觅知己：

然以论朋友游宴之乐，山川风物之美，盖不逮日本远甚，仆竟认并州作故乡矣。春秋佳日，举头东望，墨江之樱，木下川之松，龟井户之藤，小西湖之柳，蒲田之梅，泷川之枫，一若裙屐杂沓，随诸君子觴咏于其间，风流可味。以是知我两国文字同，风俗同，其友好敬爱出于天然，岂碧眼紫髯人所能比并乎[17]？

而与日本汉诗人的心心相印，盖得力于彼此驾轻就熟的笔谈：

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不作伏卢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风[18]。

这种独特的“文字缘”，消弭了口语不通的障碍，使黄遵宪在明治汉诗的舞台上，得以尽情一展身手。在当时驻日使馆成员中，黄遵宪虽然刚过而立之年，却才华最为出众，因此也最受日本学者欢迎。王韬《日本杂事诗序》曾形象地描绘了这种众星拱月、风起云从的盛况：“日本人士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履满。而君为之提唱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石川鸿斋《日本杂事诗跋》也说他“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履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现仅将最新版《黄遵宪全集》中他为日人著述所作的序跋以及评语列示如下，以见其在日文化活动彬彬之盛：

1878 为迹见花蹊辑《彤管生辉帖》题《满庭芳》词

1878、6 为《赖山阳书翰》作跋

1878、11 为儿玉士常《中学习字本》作序

1879、2 为浅田宗伯《先哲医话》作跋

1879、3 为石川鸿斋《文章轨范》作序

1879、10 为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作跋

1879、12 蒲生重章《近世伟人传》第四编书后

1880、1 评冈千仞诗

1880、4 题蒲生重章《近世伟人传》

1880、4 又为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作跋

1880、6 再为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作跋

1880、6 为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序》作评

1880、6 为浅田宗伯《仙桃集》作序

1880、7 为冈千仞《与某论再求仲由书》作评

1880、8 为城井国纲编《明治名家诗选》作序

1880、7 为冈千仞《藏名山房集》作序

1881、4 为浅田宗伯《牛渚漫录》作序

- 1881、5 为安井息轩《读书余适》作序  
 1881 为冈千仞《北游诗草》作序  
 1881、7 为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作序  
 1881、8 为《斯文一斑》第七集作评  
 1881、8 为《斯文一斑》第八集作评  
 1881、9 为《斯文一斑》第九集作评  
 1881、 为蒲生重章《近世伟人传》题词  
 1878-1881 为蒲生重章《裴亭诗钞》作序  
 1878-1881 为藤川三溪《春秋大义》作序  
 1879-1881 为青山延寿《皇朝金鉴》作序  
 1878-1881 为生田水竹《畿道巡回日记》作序  
 1879-1881 为《送佐和少警视使于欧洲序》作序  
 1879-1881 为《爱国从谈序》作序  
 1899、12 为副岛沧海《孔子诗》作跋

再看他与各色人等的日常交往。黄遵宪白云：“遵宪来东，士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19]”据笔者统计，仅《黄遵宪全集》提及的与其有过交往的明治人士，就多达79人。依该书页次列举，则有：石川鸿斋、宫本鸭北、有栖川炽仁亲王、重野成斋、岩谷六一、日下部东作、蒲生重章、冈鹿门、宍户玘、小野湖山、秋月种树、佐野雪津、伊藤博文、榎本武扬、浅田宗伯、大沼枕山、南摩纲纪、龟谷省轩、青山延寿、森春涛、鲈元邦、森槐南、宫岛诚一郎、鹤田嫩姪、鹤田元缜、关义臣、内田九成、原苇清风、大河内辉声、畠南仙史、增田贡、川田瓮江、城井锦原、迹见花蹊、小森泽长政、儿玉士常、藤川三溪、生田水竹、副岛沧海、中村敬宇、金子弥平、井上子德、宫岛大八郎、松井强哉、谷山之忠、高木正贤、池田宽治、加藤樱老、内邨绥所、手冢寿雄、木原元礼、小山朝弘、杉村武敏、松平庆永、有马道纯、植树家壶、山田则明、宫部襄、川岛浪速、向山黄邨、曾根俊虎、高谷龙州、石幡贞、栗木锄云、本多正訥、三浦安、中川雪堂、伊地知正治、谷干城、荻原西畴、胜海舟、吉井三峰、吉井友实、古贺谨一郎、税所笃三、菊池溪琴、长冈护美、大久保利加、中村确堂。如果再加上有姓无名或有名无姓的人，以及虽有交往而未见于记载的人，为数则应更多。

黄遵宪在明治汉学界如此备受礼遇，实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在此前的江户锁国时代，日本汉诗人对一海之隔的西土大陆，可望而不可及，无奈之下，那些来往于长崎、本属贩夫走卒的清朝客商，也成为他们竞相延揽的对象，以聊解不得亲炙“本土”人士之渴，江辛夷（芸阁）之流的暴得大名，正缘此之故。明治之初，黄遵宪这样学养丰厚而又身兼外交官的“正宗”文人的到来，不啻空谷足音，汉诗人自然要对他群起追捧，恭恭敬敬执弟子礼。另一方面，维新以后，西学盛行，传统的汉学开始感到威胁，危机意识日益加深。宫岛诚一郎曾对黄遵宪说：“今敝邦诗道大衰，因阁下挠正，欲兴起此风，所以有寸心也。”黄遵宪答道：“谨当如命。[20]”也理所当然地以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

这样一来，面对接踵而至、积案盈箱的求教文稿，黄遵宪便常常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祇能利用去旅游地度假的闲暇，来了却这些额外的“文债”。有一次宫岛催他改稿，黄遵宪答曰：“入今年来，他人文稿积几案者如山，都以箱根了此一切文字债也。”“螻堂诗留此过久，惭愧之至。并携往箱根了之。并其它友人之作，约有二十余本。箱根无事，数日中能尽了之也。[21]”即可见其繁忙之一斑。但在这么大的“作文批改”中，他最倾注心血的，还是宫岛诚一郎的《养浩堂诗集》。

宫岛诚一郎（1838-1911），字栗香，号养浩堂，于明治政府历任要职，是黄遵宪在日期间交往最密切的友人。在现存他们之间的笔谈、信函中，作诗始终是中心话题，正如黄遵宪在《养浩堂诗集序》中所说：一年四季“未尝不相见，相见未尝不谈诗”。为了这部诗集，他“既为之校阅四五过，复系以评语累千万言[22]”，竭诚尽力，无以复加。与此同时，他也从严把关，并不因友人情面而稍作宽容，批评可谓声色俱厉，乃至有人“或以为过刻[23]”。如刚刚着手删订时，他即致函宫岛：

大稿经一再读过。此二本殊少佳作，披沙拣金，偶一见宝耳。谬以鄙见，辄为删弃。其余未动笔者，仆皆以为可删，然未敢自信，冀吾子再请他人阅之耳。狂妄之罪，不敢求谅。惟恃至爱，乃敢出此言也[24]。

其它如谆谆告诫各种作诗要诀，乃至具体指点某句某字当如何修改，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黄遵宪对宫岛诚一郎的耳提面命，也可视为他对明治汉诗坛的一种批评示范。从他的各种评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日本人作诗技巧的不满，主要有二：

一曰不擅古体。他批评宫岛“足下七古似稍逊一筹，揣足下未及多读也”，并建议他“多读李、杜、苏三家[25]”。在赞菊池溪琴诗“骨气极好”时，亦叹惜“至其长篇，时有剑拔弩张，不胜其力之态[26]”。当冈千仞问他：“弊邦能诗人唯限律绝。往时江稼圃来长崎之日，观邦人古诗概为失体，概不见之。果然否？”黄遵宪立刻大表赞同：“谓日本古诗概失体，此太高之论。[27]”即便是他赞不绝口的赖山阳，在冈千仞问其“古风长古”“不知中中华矩度否”时，他也明白地回答说：“诗不如文。[28]”其实，同样的指责，既见于端坐本土、精选《东瀛诗选》的一代大儒俞樾笔下，也出自来游扶桑、戏编《日本同人诗选》的落魄文人陈曼寿口中，可知这是当时中国文人对日本汉诗的一种共同认识。

二曰不谙音律。昧于汉语而作汉诗，本是日本汉诗人的弱项。黄遵宪于此深有感触，故有时要亲自吟诵，以彰显汉诗音韵的真正魅力：“今我读诗，诸君试闻。读诗皆如此。音节好否？[29]”他指导宫岛之子学诗：“汉字一字只有一音，日本每有余音，须去其余音乃似。归为令郎言之。[30]”循循善诱，用心可谓良苦。

概而言之，黄遵宪对日本汉诗、或者说对日本汉文学整体的缺失，有过一个总括性的“忠告”：

仆之蓄于胸中未告人者，曰日本人之弊：一曰不读书，一曰器小，一曰气弱，一曰字冗，是皆通患，悉除之，则善矣[31]。

遗憾的是，此后中日关系急转直下，乃至兵戎相见，黄遵宪最终也没能看到他期待的这一共同文化结出的“善”果。

### 三

黄遵宪在对日本汉诗指弊讲画、平章月旦的同时，作为“老师”，他自己是否也反过来受到了“学生”的某种影响？关于这个问题，迄今未见有人质疑。因为中国诗人面对日本汉诗人，长期以来一直以祖传正宗自居，在先生巨大光环的笼罩下，弟子们似乎唯有俯首听命，而毫无置喙的余地，遑论“逆向反馈”？然而在黄遵宪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这种堪称“教学相长”的或隐或显的种种痕迹。本章即对此试作探究。

作为明显的事实，首先可以想到的，应该是黄遵宪就《日本杂事诗》向众多日本学者的请教。他在致宫岛诚一郎函中，就多次提到“想既改削”，“复承赐阅”，“乞尽一夕工夫削之[32]”；在致增田贡函中，也强调自己深恐“以外国人述大邦事”，语必有失，故“恳恳指正[33]”。而增田贡覆函云“向赐《杂事诗》卷，阅之玉石混淆，冠履齐列[34]”，则委婉地表示了批评。黄遵宪光绪十一年（1885）所作《日本杂事诗自序》，亦云“日本名宿若重野成斋（安绎）、冈鹿门（千仞）、青山铁枪（延寿）、蒲生子闇（重章）诸君子皆手加评校，丹黄烂然，溢于简端”，以致“余为之易稿者四”，始得成书。

然而，《日本杂事诗》之所以多方请益于日本学者，乃职是订正日本史实之故，考虑到这个特殊背景，就显然不能把它和黄遵宪对日本汉诗人的一般性指导相提并论。如果我们视《日本杂事诗》的审订为一种例外，而不予置评的话，笔者更感兴趣的则是：黄遵宪身体力行的“诗界革命”，有没有受到明治时期风靡一时的“文明开化新诗”的影响？

众所周知，黄遵宪是晚清诗界革命创作成就最为显著者。其新体诗的一大特点，即梁启超所说的“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35]”，代表作如他使英时写的《今别离》四首，分咏轮船火车、电报、照像和东西半球时差，当时就得到了诗坛大家的交口称赞。陈三立评之曰：“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渊茂，隐恻缠绵，盖辟古人未曾有之境，为今人不可少之诗。[36]”此

到，黄遵宪“百年过半洲游四[37]”，他的大量记录日、美、欧出使事迹的诗篇，也被认为是开辟了诗歌领域的新境界。陈衍《石遗室诗话》有云：“中国与欧、美诸洲交通以来，持英蕩与敦盘者，不绝于道。而能以诗鸣者，惟黄公度。其关于外邦名迹之作，颇为伙颐。[38]”

诚然，上述评价如果仅仅准之中国诗史，黄遵宪的确当之无愧。但如果我们拓宽视野，把目光投向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话，看到的就是一种另外景观了。早在黄遵宪赴日之前，东瀛的汉诗人就承维新之际西学蜂拥而入的时代风会，作了把西洋文明新事物、新语汇纳入传统诗歌形式的率先尝试。明治以后，国门大开，具有汉学素养的日本文人得以亲赴海外，看到他们以前只能通过书本神游的外部世界，并诉诸吟咏，形诸笔墨。众多漫游中国大陆的诗作姑且勿论，明治六年（1873）成岛柳北周游欧美归来，其《航西杂诗》在记述西方世界异域风情方面，已着了先鞭。明治八年（1875）森春涛编辑的《东京才人绝句》，则汇集了明治初期题咏“文明开化”的代表性成果。川田瓮江序云：“昔者咏物，花鸟风月；而今则石室电机、汽车轮船。耳目所触，无一非新题目。”“森翁此编，作诗史读，可也；即作文明史读，亦无不可。[39]”且略举其诗题、内容及作者如下：

航西杂诗	咏“伦敦”等	成岛柳北
夏日病中作	咏“中外新闻”等	铃木蓼处
横滨杂诗	咏“瓦斯灯”等	关根痴堂
杂咏十题	咏“女学校”等	藤堂苏亭
赠新闻记者某	（如题）	铃木半云
博览会	（如题）	八木萃堂
.....		

森春涛于同年创刊并主编的汉诗文杂志《新文诗》，则以每月一期的速度，不断推出标榜“清新”的汉诗近作。这份刊物虽然本以在维新大潮中“独守旧业”，即坚守汉诗园地为宗旨，但一如其刊名《新文诗》实为谐音“新闻纸”（日语两者发音相同）那样，能顺时应变，在已显落伍的汉诗这一文学样式中吹进“文明开化”的新风，也称得上是“化腐为新，工亦甚矣[40]”。阪谷朗庐更赞之为“吾家吟坛新闻纸”，“新闻纸示劝戒于新话，而新文诗放风致乎新韵，皆新世鼓吹之尤者[41]”。下面且拊拾数例，看看他们是怎样用“新韵”来作“新世鼓吹”的。

铃木蓼处《题风船图》：

西人技术亦奇哉，舟在青空尽溯洄。

见得谪仙诗句是，孤帆真个日边来[42]。

诗有想象，有情韵，用典也恰到好处，因而被视为明治汉诗的代表作，入选各种诗集。但与之相反，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扞格难通者，也在所难免。如芳川越山《明治九年十二月设海底线于阿波州，竣工有作》：

非因要害碍楼船，一锁投来万信传。

休道相思南北隔，偷从海底两情牵[43]。

诗前半颇为稚拙，几近不文，但后半称扬电线暗递相思，与黄遵宪《今别离》礼赞电报遥寄情愫，在借科学技术昌明写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这一点上，就不无相通之处。

森春涛不仅以《新文诗》为阵地，为这一汉诗新潮推波助澜，他自己也时时挥笔上阵，鼓噪呐喊。他于明治十四年（1881）六月将作新潟之游，友人杉山三郊作序送之，称新潟其地“西洋各国亦争辐凑，于是火轮之船，电机之线，山水人物，殆有与昔时异观者，而从未尝见有笔描其形胜，写其风俗者，岂不昌平一大遗憾乎哉？岁之辛巳夏六月，春涛森先生将启新潟之行，赋诗曰：“此行要问今风俗，吾意将翻古竹枝。[44]”收于《春涛诗钞》的《新潟竹枝》组诗，虽然传统意象仍然在唱主角，但“铁轮”、“火井”、“邮签”、“巨舰”、“人力车”等新名词，也时时现于笔端[45]。用“古竹枝”写“今风俗”，正是当时汉诗坛流行的一种风尚。

最为集中的例证，是黄遵宪赴日前夕，明治十年（1877）八月上野博览会开幕，《新文诗别集》第9号为之特辟专号《上野博览会杂咏》，其诗题全部直接标举展示名目，依次为：制丝机器、谷种、矿种、漆器、陶器、酿造品、织造品、文房三具、写真翁媪匾额、写真女子匾额、洋法画匾、盆松。和洋杂陈，琳琅满目，新鲜事物的诱人魅力，扑面而来。对此当时诗坛泰斗小野湖山有一个精辟的论述，他在评松冈毅轩《上野公园博览会开场……》诗时说：

事新，则字面亦不得不新。能用新字面以作稳雅诗，非毅轩翁决不能也[46]。

这里的“能用新字面以作稳雅诗”，和陈三立所说的“以新事而合旧格”，梁启超所说的“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如出一辙。面对来势汹涌的西方文明大潮，东瀛西陆汉字文化的子孙们为拯救祖传家业开出的药方，竟然如此不谋而合，实在是意味深长。

到黄遵宪抵日后，这一热潮依然有增无减。《新文诗》第30集卷末载“皆笑社月课文题”，即明治十一年（1878）该诗社的每月共同课题，四月为“气球船喻”，八月为“电线说”，而不是惯例的赏樱、玩月，追新逐奇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一年，正是黄遵宪开始与明治汉诗人广为交流的重要年份。

综上所述，在黄遵宪赴日前以及在日期间，日本汉诗坛以《新文诗》为中心，正劲吹着一股“文明开化”之风。以“采风问俗”的“古之小行人、外史氏[47]”自任的黄遵宪，而迎这一古典诗歌王国前所未有的巨变，怎么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呢？

进而而论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黄遵宪与明治“文明开化新诗”之间，确实有着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以开风气之先的森春涛为例，黄遵宪就与之多有交往。明治十一年（1878）清使何如璋特访森春涛，森作诗志其事，黄遵宪次韵，并于题下注云：“髯翁素工香奁，戏仿其体。[48]”来日仅仅一年，就对森诗风嗜好了然于心，可见过往之密。黄遵宪致森春涛的个人信函，还分别刊载于《新文诗》第55、57、62集，其中并谈到对春涛之子森槐南所作戏文《补春天传奇》的指导，父子两代，交谊深厚，黄遵宪因为这种特殊关系，对《新文诗》杂志以及森春涛所编所写的其它诗作时有寓目，当为情理中事。不仅是森氏父子，黄遵宪与上文涉及的小野湖山，川田瓮江等人，也均为酬酢甚勤的友人。前文所云那些慕名而来、登门求教的众多人士手上，想必也经常捧着“文明开化”的诗篇。何况黄遵宪为撰写《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曾广泛浏览当时报刊杂志，登载的汉诗文固不必说，即使是日语的“新闻纸布令”，他也自称“然仆观之，不译亦知其事也[49]”。因此，在他触目可及的大量日本文献中，明治“文明开化新诗”这株刚刚破土而出、沾着新鲜露珠的诗苑奇葩，必然会引起他浓厚的兴趣。

其实，黄遵宪在日期间，对这种新体诗可以说已经初尝鼎脔。《日本杂事诗》第53、175、178、181首分咏新闻纸、照像、博览会、人力车，就已显示出他驾驭此类题材的娴熟功力。《日本国志》里日人新创的西文译语，即所谓的“和制汉语”，更是纷至沓来。可是，《日本杂事诗》作为叙事性的大型组诗，最初的写作目的如黄遵宪所说，是“仆东渡以来，故乡知友邮筒云集，辄就仆询风俗，问山水，仆故作此以简应对之烦[50]”，与专以某一新奇事物为对象、即传统意义上的“咏物”之作，毕竟还有区别。这里且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黄遵宪对引舶来文明入诗所持的积极态度。

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的石川鸿斋编《芝山一笑》，收有清朝驻日钦差副使张斯桂的《观轻气球诗》，对这“泰西气球新样巧”的新奇事物，作者发出由衷的感叹。石川自己也和了一首《戏次其韵》，其诗中有云：

闻说洋人始新制，图敌瞰营施奇计。

或历宇内捡广狭，又阅舆地极微细。

对此黄遵宪评曰：

奇思异想，真入非非。亦广大，亦精微，是不可思议功德也[51]。

按黄遵宪在来日前作于同治九年（1870）的《香港感怀》中，已提到了“气球”，若论《人境庐诗草》用新名词，这也许可算作最早的一例。而咏赞气球的张斯桂，也是一个自称“心地尚若少年，意欲纵观天下奇形怪状一切事情[52]”的好事之人，他的《使东诗录》，即收有《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幼儿园学校》等观新赏奇之作，而《和竹添鸿渐赠诗原韵》一诗，更对当时的诸般“神器”备加礼赞：

飞车碾铁雷声动（火轮车路），驰传闻钟电气通（电线信局）[53]。

身为使臣之首的何如璋，同样对此类话题别有青睐，其《使东杂咏》第56首咏“电气报”云：

柔能绕指硬盘空，路引金绳万里通。

一掣飞声逾电疾，争夸奇巧夺神工[54]。

自注：电气报以铜为线，约径分许，用西人所炼电气。或架木上，或置水中，引而伸之，两头以机器系之。所传之音，傅线以行，虽千万里顷刻可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在他们治下的清使馆中，便不时有此类“新诗”的具体实践。何如璋在一次与黄遵宪以及日人的共同唱和中，就曾以当时最摩登的电话为题：

近西人有电器名德律风，足以传语，故以此为戏：

何须机电诩神通，寸管同掺用不穷。

卷则退藏弥六合，好扬圣教被殊风[55]。

黄遵宪自己也并非徒作旁观。《戊寅笔话》记大河内辉声在新买的一把“洋伞”上题诗，并请黄遵宪也题一首，黄乃作“戏作四言铭”：

亦方亦圆，随意萧然。

朝朝暮暮，可以游仙。

替笠行露，伴蓑钓烟。

举头见此，何知有天[56]？

按《日本国志·礼俗志》叙日本女子所持之伞，“伞仿西洋制，名蝙蝠伞，谓张之其翼如蝠也”，《日本杂事诗》第103首自注亦云曰女子“出则携蝙蝠伞”，足见其对这一舶来生活用品的注意。这首诗虽然属于“戏作”，用语也纯然古风，但既然题在洋制“蝙蝠伞”上，也可以视为黄遵宪“奇思异想”的一种尝试。

那么，为什么黄遵宪使日四年有余，上述新潮诗人可谓时相过从，新事新语也几乎每日耳濡目染，却始终没有写出《今别离》那样的杰作呢？对此我想试作以下三点解释。

首先，黄遵宪如其《日本杂事诗》定本自序所说，对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因危惧传统汉学消亡，常作指责讥议，到知其乃大势所趋，理所必然，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同样，对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新诗”，作为一名年轻时就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的革新派诗人，他自然会深感兴趣，备受启发，甚至跃跃欲试，但真正操刀染指，却尚需时日，有待观察。而在当时日本汉学界，保守势力仍居统治地位，黄遵宪就自称“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57]”，这些旧学宿儒出于对维新事业的抵触，视汉诗中阑入新名词为浅薄庸俗，诘难非议也时有可闻。明治十三年（1880）城井国纲编《明治名家诗选》，就秉承其师村上佛山遗愿，有意不选这类“新诗”。五年前对森春涛《东京才人绝句》的“耳目所触，无一非新题目”称扬备至的川田瓮江，这时也不得不韬光养晦，三缄其口，川田序引村上佛山之语云：“近日作者投时好，如气球、电机、轮船、铁路，争入题咏，奇巧日加，忠厚日亡，今而不救，恐有流弊不可胜言者。[58]”黄遵宪也应邀为这部诗选作序，听到如此痛心疾首的呵责申斥，不会不有所避忌。何况如前所述，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对日本汉诗人本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指导地位，“新诗脱口每争传[59]”，这些被“争传”的“新诗”，实际上还负有示范本土标准、乃至整肃诗坛纲纪的重要使命，如果他也随波逐流，加入世俗称颂“奇巧”的行列，或许将有损于他国粹护法神的形像。而到了英国之后，他显然已经没有这种多余的顾虑了。

其次，黄遵宪对西洋文明事物本身，也还需要理解消化。日本因同属东方国度，在此所见所闻，毕竟只是中转贩卖的“二手货”，真实的欧风美雨，还有待今后的亲历。再说像地球东西时差那样的“国际知识”，不做亲身体验，是无从真切感知的。

再者，黄遵宪作诗的谨慎态度，也可能使他不愿率尔操觚。“公度诗自命另开一新面目，最不肯轻易落笔。[60]”黄遵宪在致宫岛诚一郎信中，也嘱其作诗务必推敢再三：“《四库目》论陆放翁，讥其作诗太多，故伤冗滥，通人当知其意，无俟仆喋喋也。[61]”《今别离》四首，也许正是因为经过长期孕育，终于瓜熟蒂落的缘故，才能想落天外，与古为新，意环笔绕，穷形尽相，较之明治诸公，无疑堪称后来居上。

毋庸讳言，黄遵宪的新体诗也并非登峰造极，无懈可击。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在赞扬黄遵宪的同时，曾批评“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表自异”，“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而钱锺书《谈艺录》则认为黄遵宪也不免此病：“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遗憾的是，随着二十世纪以来旧体诗本身的全面衰退，怎样才能真正获取，自由表现“新理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大概今后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当然这已是另外一个范畴的话题了。

明治前期，清驻日使馆以何如璋、黄遵宪以及继任的黎庶昌为代表的使臣们，通过与日人唱和往来、点评批改，对明治汉诗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研究者已多有论述；但反过来他们自己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明治汉诗的影响，对此似乎尚未有人问津。本文在综合论述黄遵宪与日本汉诗关系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只能说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抛砖引玉，切盼识者有以教之。

作者简介：蔡毅，日本南山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1] 管见所及，略作涉及的有：陈捷：《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研究》，汲古书院，2003年；王宝平：《清代中日学术交流研究》，汲古书院，2005年。单篇专论尚未见。

[2] 林香奈：《「日本雜事詩」における日本漢詩に関する記述について》，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235页。参见《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5《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岩波书店，1991年，529页。

[3] 《今四家绝句》卷首，富士川英郎等编《词华集·日本汉诗》第11卷，汲古书院，昭和59年（1984），6页。

[4]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296页。以下引该书均简称《全集》。

[5] 《全集》所收《戊寅笔话》第101话，634页。

[6] 锺叔河辑注《日本杂事诗广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6页。

[7] 《全集》249页。

[8] 《全集》所收《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775页。

[9] 《全集》所收《与冈千仞等笔谈》，791页。

[10] 同注9，788页。

[11] 《全集》129-130页。

[12] 《全集》261页。

[13] 《全集》所收《致冈千仞》，316页。

[14] 《全集》所收《己卯笔话》第88话，690页。

[15] 《全集》所收《庚辰笔话》第28话，704页。

[16] 《全集》所收《己卯笔话》第88话，694页。

[17] 《全集》344页。

[18] 《全集》所收《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722页。

[19] 《全集》所收《中學習字本序》，241页。

[20] 《全集》所收《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755页。

[21] 《全集》所收《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767-768页。

[22] 《全集》261页。

[23] 《全集》所收《己卯笔话》第88话，692页。

[24] 《全集》303页。

[25] 《全集》所收《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728页。

[26] 同注25，769页。

[27] 《全集》所收《与冈千仞等笔谈》，789页。

[28] 同注27，791页。

[29] 《全集》所收《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739页。

[30] 同注29，760页。

[31] 《全集》所收《己卯笔话》第88话，690页。

[32] 《全集》297页。

- [33] 《全集》312页。
- [34] 《全集》318页。
- [35] 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引《饮冰室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257页。
- [36] 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今别离》注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517页。
- [37] 《全集》所收《己亥杂诗》第1首，153页。
- [38] 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282页。
- [39] 森春涛编《东京才人绝句》，明治八年（1875）刊印，1页。
- [40] 川田瓮江：《读新文诗》，森春涛编《新文诗》第1集，明治八年（1875）刊印，1页。
- [41] 阪谷朗庐：《赠春涛老人》，《新文诗》第1集，明治八年（1875）刊印，11页。
- [42] 《新文诗》第5集，明治九年（1876）刊印，9页。
- [43] 《新文诗》第14集，明治十年（1877）刊印，7页。
- [44] 杉山三郊：《送春涛先生游新潟序》，《新文诗别集》第14号，明治十四年（1881）刊印，4页。
- [45] 《春涛诗钞》卷十五《新潟竹枝》，富士川英郎等编《诗集·日本汉诗》第19卷，汲古书院，平成元年（1989），126-128页。
- [46] 《新文诗》第21集，1页。
- [47] 黄遵宪：《日本国志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2页。
- [48] 《新文诗》第42集，明治十一年（1878）刊印，6页。
- [49] 《全集》所收《戊寅笔话》第170话，680页。
- [50] 黄遵宪：《与森希黄》，《新文诗》第62集，明治十三年（1880）刊印，10页。按该文《全集》失收。
- [51] 见王宝平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第1种《中日诗文交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影印版，71页。
- [52] 小野湖山：《题张副使彤管生辉次韵诗后》，《新文诗》第56集，明治十二年（1879）刊印，2页。
- [53] 《走向世界丛书》所收何如璋等：《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岳麓书社，1985年，148页。
- [54] 《走向世界丛书》所收何如璋等：《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岳麓书社，1985年，125页。
- [55] 《全集》所收《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722页。
- [56] 《全集》所收《戊寅笔话》第159话，665页。
- [57] 《日本杂事诗自序》，《全集》6页。
- [58] 城井国纲编《明治名家诗选》卷首，明治十三年（1880）刊印。
- [59] 黄遵宪：《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全集》105页。
- [60] 潘飞声：《在山泉诗话》，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278页。
- [61] 《全集》308页。